



ZUO JIA JIAN TAO YU WEN XUE ZHUAN XING

# 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

商昌宝◎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 / 商昌宝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133-0073-5

I. ①作… II. ①商…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1725 号

---

## 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

商昌宝 著

责任编辑:李梓若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九尺堂文化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23.50

字 数:310千字

版 次:2011年11月第一版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073-5

定 价:38.00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 策划人语

站在21世纪的门槛内，20世纪便已然成为遥远的历史。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已养成一个习惯，对于历史，不是习惯忘却就是麻木冷漠。即便是在回顾和反思之时，也总是喜欢“宽以待人”、“揩干眼泪向前看”。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历史从来就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中国人的历史也便在这循环中充斥着更多的悲情、无奈和嘲讽。自晚清国门被打开以来，世界性的普世价值成为我们的参考物，中国也开始艰难地向现代迈进。然而，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自大意识，不时地扮演着瓶颈的角色，使得中国的现代之路愈发艰难和曲折。别林斯基曾慨叹：仅仅是为了强调常识，我们不得不费尽力气并付出惨重的代价。在特别国情之下，我们民族已经费尽了全部的力气，也付出了20世纪世界最为惨重的代价，却仍然没有抵达常识的边缘。这的确是个问题。

显然，恢复常识无论是过往还是当下，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而如何恢复常识，却又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棘手问题。纵观学界这些年的努力，有两点大概至关重要。其一是记忆。关于记忆，舒衡哲（Vera Schwarz）在《流离的记忆女神》一文中述及，记忆并不是抽象或仅属个人的事，记忆就是重温民族的过去，令它融入并改变个人的命运。……我们不但要记住美好的恩赐，也要记住邪恶的，令我们受苦的东西……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徐友渔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设想：“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灾或人祸降临一个国度，它毁掉一切的厂房、机械、实验室、银行，但未毁掉这个民族的记忆，包括知识技能、图书馆、文艺作品；而另一种灾难则

性质相反，它摧毁全部记忆而保留下一切物质的东西。现在问，这个民族经历哪一种浩劫之后更容易恢复生机？”对此，他的答复是：“我根据理性判断和历史经验可以断然说，比较而言，前一种情况对人的危害较轻。我相信，彻底斩断记忆将使人退回到史前时期。”因为“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记忆的重要已无须重申，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在如何记忆的问题上，是否可以做到文史兼备，即历史承载与文学讲述的珠联璧合，倘能如愿，其结果和效果都将充满无限张力。

另一个就应该是材料了。历史需要材料早已是颠簸不灭的真理，而相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材料同样重要。王尧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曾说：“‘回到历史现场’曾经是蛊惑人的提法。我无法说清楚我们有无可能重返历史场所，但在对历史文献的阅读中我们会呼吸到历史的真实气息，即便它已经发霉，历史的质感因为有了这些文献而存在。”他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史料的挖掘、整理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张志忠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需要认真的发掘，这一努力永远不会停止。但是，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话题，因而是有着持续关照的必要性的。”可见，文学之于材料，原本就与历史的需求相统一。特别是面对20世纪中国文坛文学经典少之又少的尴尬局面，所谓的纯文学研究竟该如何评估其学术价值，相信坊间早有定论。而那些倚重于史料的思想性、文化性的文学研究，事实上在学界中也早已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或者可以这样说，当下的文学研究若背离历史，就如同沙滩上的建筑，是禁不起时间检验的。

历史和现实既然已经走到当下这一步，恢复常识和走向正轨自然就不是件容易事。一段时间以来学界虽一直在为此努力，成果也在步履维艰中不断走向辉煌，于是，尘封中的历史便在不断

被还原的现场中逐步清晰起来，真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但是，由于历史的积弊与现世的纷扰，一些领域尚未得到开掘，一些问题尚待重视，一定的空白也尚需填补。我们策划“文史现场书系”，就是要以客观、审慎和敬重的态度回到历史现场，通过爬梳和整理那些显在的、隐藏的、被忽视的、即将散失的文献，以还原那一段历史的本真面目。在这其中，当年的社会情状、政治背景、人事纠葛、以及个人思想历程，相信都将在鲜活的历史现场中一一呈现出来，不必赘言辩解。另外，我们之所以取名“文史现场”，自然也有这样的宏伟设想：进一步打开文史间的隔阂，努力克服历史研究缺乏人文关怀，而文学研究则缺少理性与厚重的畸形现象，让所谓的“文史不分家”真正落到实处，也在一定意义上赋予学术以思想史意义。

策划“文史现场”这一书系，尽管有着足够的学术积淀和思想支撑，但是我们也深知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有限，而学术空间又无限广延。况且面对当下纷繁缭绕、急功近利的图书市场，我们并没有抱太大的野心，只想试着以投石问路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倘若心力不足，则选择小憩，待时机成熟再行向前。

策划人 方可

2010年6月30日

# 序

李新宇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发生了一次整体性的转型，文学由作家自由创作变为国家计划生产，文坛由多元转向一元，作品由争奇斗艳化为整齐一致。作家们告别各自早已形成的风格，从题材到形式，全面适应政治的要求，从而形成了文坛史无前例的新面貌，并且铺平了此后十七年以至“文革”时期的文学道路。过去的文学史对这一转变多有描述，但有一个问题却一直缺少回答：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作家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熟悉的题材、改变自己的道路、放弃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会扼制自己的个性而去写那些千篇一律的作品？固然，它是响应领袖号召的结果，但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作家，见识过1930年代文坛多元状态的作家，醉心于艺术独创的作家，那么容易被“一体化”吗？

商昌宝的这本书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的。面对中国新文学的这次转型，他执著地想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想知道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力量使一代作家那么迅速地发生了转变，并且成功地造就了文学园地的整齐和一致。

这样的选题意义无须多说。然而，更为独到的还是商昌宝的切入角度——作家的检讨，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很少有人涉足的特别领域。一般说来，要研究文学的这次转型，不能不关注三个层面：一是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运动，因为正是它不断在向作家亮黄牌、敲警钟，使之知道了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怎样写可行，怎样写不可行。二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它是文艺批判运动的广阔背景和时代文化支撑，只有在这一背景上，作家艺术家的转变才不再是孤立的事件，一些所谓奥秘才可以破解。三是文艺批判运动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背后作为制度支撑出现的一系列

措施，如关闭自由市场、建立文化生产的计划体制等。而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显然是作家的“国有化”和“单位化”。商昌宝对此都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但他知道，全面研究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而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角度，考察作家们的检讨书。检讨书是一种特别的文本，包含了丰富的时代文化密码，要考察那个时代作家的精神状况，它的价值的确是别的文本无法替代的。记得沙叶新先生在题为《检讨文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他也很可能从没写过情书，但不太可能没写过检讨书。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都做过检讨，连邓小平、陈云这样的辅弼重臣都写过检讨书，你敢说你没有？上自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中及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下至工农大众、普通百姓，更别说‘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了；无论你是垂死的老者，还是天真的儿童，只要你被认为有错，便不容你申辩，真理始终掌握在有权说你错的领导和自认永远对的领袖手中，自己只得低头认罪，深刻检讨……”然而，对于这种“检讨文化”的载体，学界却一直缺少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昌宝对作家检讨的研究无论做得怎样，都已具有了独特的存在价值。

正如沙叶新所指出的，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谁没做过检讨呢？既然如此，作为研究对象，材料应该是丰富的。然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真要收集研究，却会面临各种困难。首先，作为一种特别文体，虽然许多知名人士的检讨都曾发表在报刊上，但那不过是沧海一粟，更多的文本并未进入传播，而是被装入了各种不同的档案袋。其次，对许多人来说，那些检讨书无疑是光屁股照相，有多少人愿意把它公开呢？无论作家还是学者，很少有人愿意把那些东西编入自己的文集。据我所知，一位已故作家出全集，负责编辑的是他的弟子，细心而负责，因而文稿收集齐全，但到最后，却在亲属强烈要求下删除了两类文稿：一是他批判别人的文章，二是他的检讨书。在这个问题上，明理而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并不太多，据我目光所及，自己把检讨书编入文集公

开出版的只有邵燕祥等，而把先人的检讨书编入文集的也只有郭小川的子女郭小林、郭小惠等。此外，《聂绀弩全集》、《朱光潜全集》、《沈从文全集》、《赵树理全集》等虽也不同程度地收有这样的内容，但也只是九牛一毛。因为这种情况，研究就相当费力。所幸商昌宝四处搜索，终于把各派知名作家的检讨大致收集起来，使自己的研究不至于成为无米之炊。

在广泛阅读文本和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商昌宝发现不同派别的作家有完全不同的情况，因而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研究，从中找出了各自不同的精神演变轨迹，并且对其代表性人物进行了剖析。在研究中，商昌宝的提问方式无疑是尖锐的。比如，他首先涉及的问题之一是：那些检讨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涉及更为严重的层面：如果是真的，作家们何以突然变得那样幼稚？如果是假的，作家们何以突然竞相说谎？这种追问的确有点严厉，而且把他们置入一个几乎无处可逃的境地。在一系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个很不乐观的结论：“五四”之后形成的所谓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事实上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并未完成，因而面对历史的考验，未能交出合格的答卷，而是丑态百出了。商昌宝认为，中国作家的这些弱点也许仍然存在，因而必须正视的，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该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弱点，从而克服这些弱点。

当然，商昌宝的这种研究必然要面对许许多多困难。首先，在我们这个群体中，一些人是不愿认错、不愿忏悔的，也是不愿正视自己的耻辱和丑陋的。商昌宝的研究却似乎执意要把一些人竭力遗忘、拼命掩盖的往事揭开来，这无疑是揭伤疤，或者简直是揭丑行。在检讨的时候，出卖朋友、落井下石、伤害别人以求自保的行为屡见不鲜。这就决定了商昌宝的工作必然会使一些人不快。尽管他竭力避免碰伤任何人，而且无意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一些事实无法回避，摆出来就难免要让一些人“出丑”。在中国，无论做人还是做事，让人出丑无疑是大忌。因此，在看过论文第一稿之后，我曾提醒他：你说的都是事实，但这样让人出丑，是很讨人嫌的。为了弄清历史，商昌宝不怕讨人嫌。说真



的，我不愿我的学生讨人嫌，却很赞赏这种勇气和科学态度。与此同时，商昌宝还遇到了一个问题：面对特定环境中的作家言行，用正常的尺度要求，是否过于苛刻？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崇尚宽容。因为我们经历过大家都不光彩的时代，说句通俗的话，就是“大家屁股底下都不干净”，因此，“法不责众”，对人对事都无法用较高的标准要求。面对一些不光彩的行为，人们往往喜欢“同情的理解”，把责任归于空洞的历史，归于无人负责的时代。常见的说法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作家能怎样呢？他们也是人，也有妻子儿女，也要生存……所以，他们的怯懦，他们的虚伪，他们的见风使舵和损人利己，似乎都应得到同情。作为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新一代学者，如果对前人责备过重，就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商昌宝恰恰没有经过那个年代，而且对作家的剖析常常不留情面。所以，在答辩时就有先生善意地让昌宝设身处地想一想，并且半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答辩委员会现在决定让你删除那些尖锐的批评，否则就不予通过，你删还是不删？有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在危及生存的选择面前，任何人都可能表现出软弱性。饭碗的力量是大的，任何精神上的控制都不如饭碗的控制更有效。所以，精明的控制者一般不会满足于精神手段，而真正的威力也并不来自批判或“洗澡”。对此，商昌宝事实上早有思考。所以，面对这个问题，他老实地承认：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就不能毕业，就找不到工作，甚至要饿死，我会改变我的观点，但我决不会认为这是正常的或正当的，我会为我的行为感到耻辱，而不会夸耀我的“光荣”。他所涉及的，的确是一个尺度问题。他所坚持的，不是苛求特定环境之下的某些作家，而是某种道德和人格的评价标准。因此，他执著的并以实例争辩说，在一些作家竞相说假话的时候，并非不说假话就活不下去；在一些作家对朋友落井下石的时候，并非不对别人落井下石自己就必须死，历史的事实证明，很多时候作家们并没有被逼到那样的地步，那些积极表现的，常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好处。面对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放弃道德追问的。如果因为“大家都如

此”就降低我们的道德标准，那就更加可悲了，所谓文化建设，将从何谈起？

因此，这本书既是面对历史的，又是面对现实的。商昌宝说，在当年政治高压之下所做的一切如果可以理解和原谅的话，在今天如何对待自己当年的言行，却是一个作家人格的试金石。不难看出，商昌宝希望人们面对历史而有所反省，有所忏悔。

本想只写一两页，却一开头就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重读书稿，我最初的感受仍然未变：如果背景展开更宏阔一些，板块构成更完整一些，个案剖析更深入一些，或者如果写成多卷本，让各派作家自成一卷，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将是多么可观的巨著啊！但愿昌宝能够继续做下去。

2010年5月，天津南开馨名园

## 导 论

世纪之交以来，关于当代文人群体、文学创作的质疑和批评之声可谓此起彼伏，振聋发聩。

学者李新宇在《百年中国的文学遗憾》中曾总结说：“中国的文人作家很灵活，善于顺时应势，调整自己。这种灵活性可能与中国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有关，与中国文人长期以来需要看统治者的眼色吃饭有关。这种灵活性使20世纪中国作家暴露了很不光彩的一面：无操守，无恒心，容易摇摆而不能坚守；东风中西倒，西风中东歪，审时度势，总是为潮流所裹挟。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创造和发现，影响了文学和一切精神生产的质量。”<sup>①</sup>因为如此，黎鸣曾有“中国的文人是最低鄙下流的”的论断，引发知识界和民间的一场大地震；年轻学人则归纳出了所谓“奴隶的法官情结”，并进而阐释道：“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主旋律是欺人与自欺，文人由社会的进步力量退化成帮凶和帮闲，他们左手拉着鲁四老爷、右手拉着假洋鬼子，亲亲热热如同一家人。”<sup>②</sup>或者，这样堕落的场面连外国人也看不过去了，德国汉学家顾彬2006年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直言说：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不敢直面现实，缺乏自己的声音。<sup>③</sup>及至2010年初，肖鹰在回应陈晓明的“中国的立场”、“中国的方法”以及所谓“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时，也尖锐地指出：“当今的‘中国作家’人数，无疑世界第一，但是，真正履行作家社会职责的人数，实在为数不多。”即便是那些早期的严肃文学作家，也“纷纷转入了‘孤岛写作’，他们沉迷于玩无聊、玩深沉、玩技巧”。他们的群体精神和人格“极度萎缩”，已经“从‘严肃

① 李新宇：《百年中国的文学遗憾》，《作家》，2000年第4期

② 摩罗：《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序二》，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

③ 《德国汉学家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重庆晨报》，2006年12月11日

写作的作家’变成了‘玩严肃的作家’”。而当下的文艺批评家们已经“高度职业化，同时也高度商业化和小集团化”，实现了所谓的“和谐组合”。<sup>①</sup>可见，作为曾经的所谓“灵魂工程师”，作家群体不但光环早已不再，甚至早已成为批判的靶心和众矢之的，仿佛一夜间由“红砖”变成了臭石头。面对这样一个窘境，学界自然不应该继续沉默以对。

关于文学创作，韩少功在历陈当前小说的两大病状后补充说：“小说需要个性，但个性并非新的普遍性。”<sup>②</sup>雷达在对当前文学创作症候的把脉中指出：“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期待的文学大师没出现，而文学原创能力似乎在丧失，畸形的复制能力在增大，文学数量与质量之比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生态。”<sup>③</sup>汪政、晓华指出：“对于文学来说，要慎提思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可以拒绝意义，拒绝思想。”<sup>④</sup>肖鹰也在不愿把话“说绝”的前提下指出：“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不应有的低谷。”“当今中国文学在作品数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包含了太多的泡沫甚至垃圾。因为商业侵蚀，文学创作的低俗化、恶俗化趋向是当下中国文学低谷状态的突出表现。”<sup>⑤</sup>在诗歌领域，罗振亚指出：“力量感的匮乏是目前诗坛很大的困惑。……在艺术上趋向于匠人的圆滑世故与四平八稳，诗作固然也很美，但却没有生机，缺少批判的力度，精神思索的创造性微弱，严格说是思想的‘原地踏步’。”<sup>⑥</sup>年轻诗人沈浩波在历数诗坛的怪状后总结说：“逃避、编造文化谎言和子虚乌有的文化环境，对当下性和现代性的无力

① 肖鹰：《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从王蒙、陈晓明“唱盛当下文学”说开去》，《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

② 韩少功：《个性》，《小说选刊》，2004年第1期

③ 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

④ 汪政、晓华：《2007年长篇小说创作述评》，《文艺报》，2008年2月21日

⑤ 肖鹰：《当下中国文学之我见——从王蒙、陈晓明“唱盛当下文学”说开去》，《北京文学》，2010年第1期

⑥ 罗振亚、刘波：《关于新诗创作与批评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和无知，构成了中国诗歌新的主流！”<sup>①</sup>青年诗人朵渔也在大量阅读后将诗坛总结成“秋后收割一空的大地”，“没有一点清新的精神”，甚至不无悲观地质问道：“这是一场美学危机还是一种道德危机？”<sup>②</sup>可见，无论小说还是诗歌，文学的整体创作状况的确令人堪忧。

或许正是因为无法忍受当下中国文人的堕落和文学创作的变态，朱大可2003年公开宣布“跟文学的离婚已经无可挽回”，并解释说：“这不是因为我辜负了文学，而是文学辜负了我的期望。我今后再谈文学，不会再把它作为一个文学读解的单纯对象，而是把它视作文化分析的某个因素加以考虑。”<sup>③</sup>2007年，山西作家李锐发表公开信，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退出中国作协，并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sup>④</sup>年轻作家韩寒高调宣称：“我的立场一如既往，我绝不加入作协，打死我也不干。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永远独立，绝不能被组织左右。”<sup>⑤</sup>叶匡政2006年先是宣称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宣读“文学死了！”<sup>⑥</sup>紧接着又撰文揭露了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sup>⑦</sup>随后又著文不无戏谑地说：“想成为中国作家吗？说谎是目前这个职业唯一的、仅有的条件。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自杀的本性，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虚假繁荣之后，终于走到了它崩溃的终点。文学正在成为一种毒素，成为我们生活的毒素、思想的毒素、情感的毒素、信仰的毒素……它甚至成为我们自由言说的毒素，它

① 沈浩波：《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 目睹近年来的中国诗歌现状》，朵渔主编：《诗歌现场》，2008年第5期，第207-208页

② 朵渔：《我们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诗歌现场·编后记》，2008年第5期

③ 《“作家炒作协”又掀新高潮》，<http://www.people.com.cn/GB/14738/14754/14765/2224907.html>

④ 《韩寒：绝不加入作协 作协一直是可笑的存在》，《南方周末》，2007年11月8日

⑤ 《文学死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0631.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0631.html)；《今天我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宣读<文学死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0653.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0653.html)

⑥ 《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066u.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066u.html)

舍混不清，它指东道西，它言不由衷，成为我们精神世界中最先腐烂的创伤。”<sup>①</sup>那个一直关心中国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在2007年初撰文宣称：中国1949年后的文学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之前的文学是几百块钱的“五粮液”，后在2009年的采访中直言道：“真正的德国文人、知识分子、教授们”，“都不会看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小说”，因为“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sup>②</sup>面对这样的质疑和批评，学界难道还应该再继续漠视下去吗？

客观地说，上述言论虽不乏偏颇和激进之处，也早有学者接连撰文予以驳斥和澄清，但就其内容和问题的实质来说，不能不承认它的鞭辟入里、针针见血。而那些试图回避或粉饰问题的人，可以说，要么是无视基本事实，要么是别有用心。历史既然已经进入21世纪，学界应该而且也必须对这些质疑和批评做出应有的学理性回应。因为说到底，这关涉到所谓当代中国文人群体的整体评价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发展、定位和未来走向等根本性问题。当然，回顾历史可知，这样的质疑、批判和反思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老问题了。只不过，这次提出问题的时间和方式较比以往更迫切一些罢了。世纪之交再次提及这样的问题，显然有时间上的需要，毕竟现代中国文学已走过一个世纪，于情于理都需要做出客观的总结和展望。更重要的是，问题本身似乎也确实到了必须做出结论的地步。因为以往在这个问题上多采用遮遮掩掩、自说自话，甚至粗暴压制、强词夺理的态度和方式，一些客观的意见和言论常被无情地压制，但问题毕竟是问题，不管搁置多久，也不会消失。

那末，当代作家群体为何如此口碑不好？他们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关注点自然要落在1949年以来“极左”政治所推行的思想改造这一历史现象上。孟繁华就此总结说：“自50年代初期始，检讨之声不绝于耳，思

① 《中国作家只是在制造垃圾吗》，[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0a0p.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0a0p.html)

② 《中国当代作家基本没有思想》，《时代周报》，2009年3月13日

想能力的丧失是20世纪下半叶知识界最令人震惊的景观。”<sup>①</sup>贺雄飞说：“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文人历来是统治者的工具，得意的往往是御用文人。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反思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文人的表演，我们不难惊醒地发现：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sup>②</sup>事实表明，这个群体在历史转型的大考验中交出了一份令人困惑、失望以致绝望的答卷。从当事人的众多事后回忆和“忏悔”的文字来看，在当年的“改造——检讨”运动中，确有那么多的人是真诚的，真诚到坚贞不渝，至死不悔。当然，“假诚”的自然也有，但却少之又少，且大概都深埋于泥土里，以致不知道还能不能重见天日。但不论真诚与“假诚”，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持续的思想改造后，他们基本放弃和丧失了独立思考以及担当社会良知的使命，甚至欣然成为委身于权力的工具和“文奴”，扮演着“帮忙”、“帮闲”及“帮凶”的角色。因此，道德失范、人格堕落、价值迷失等现象演化为作家们的生存常态，与整个社会一起进入一种欺人与自欺、整人与被整的模式中，并一直延续和潜伏下来。既如此，这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就需要提起注意，即“五四”以来形成的虽不算多却也不算少的现代文人群体，在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大环境中是如何生活、思考和工作的？他们在检讨交心时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他们的检讨是如何影响到文学的？导致他们检讨并最终完成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学界需要也应该做出回答的。

人们对当代文学的评价极差，当然是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等诸多问题。尤其越是主旋律的作品，问题的症状越为严重。毋庸置疑，以纯文学的审美标准做评判，不能不承认所谓当代文学的这些病症迄今仍未得到根本好转。应该说，比之1949年前的现代文学，所谓的当代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平的确是倒退了，而且在某些领域可以说是一溃千里。顾彬所言的“二锅头”与“五粮液”之比实在是再贴切不过。当

① 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第225页

② 摩罗：《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酋长话语》，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

然，也有过于聪明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可以以“红色经典”来招摇撞骗、自欺欺人。这其中，也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注意：即作为有着三十多年发展历程并受惠于“五四”思想启蒙的现代文学是如何转向当代文学的？或者说它为什么从“五粮液”变成了“二锅头”？为什么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等长期难以克服的问题？为何当代文学越来越媚俗、甚至出现精神和思想的沙漠化？这些，也是需要做出回答的。

林贤治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它的命运史。”<sup>①</sup>“要充分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重视个案研究，重视个体心态——人格的研究。”<sup>②</sup>本书将目标确定在“检讨”这一核心文化现象上，就是要在一定意义上再现1949年后社会转型之下，中国大陆作家的思想是如何实现转轨的，文学又是如何转型的？而之所以选择“检讨”作为言说的对象和切入点，也是欲通过文人群体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现实表现，来揭示作家主体在政治大环境下的精神、思想和行为的嬗变，以及对文学创作、批评产生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当代文人群体在思想改造中所撰写的“检讨”，是作为这个群体自身所发出的一种信号，而这其中所包含的信息无疑是丰富的。因为，作为一个被书写的产物，尽管在书写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或者如一些当事人所说是违心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各个“检讨”文本中还存在着大量程式化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文本中所体现的个性化的信息和历史细节还是非常鲜明而有价值的。正如邵燕祥对自己所写过的检讨文字评述的那样：“这一堆当代的活化石，记录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sup>③</sup>黄平也说：“不论这些文字是否是在违心的或被迫的条件下完成的，作为署有著名知识分子名字的作品，已经是

① 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自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② 林贤治：《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84页

③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序》，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2-3页



一种实实在在的符号存在，并且已经在公众心目中产生了特殊的社会影响”。<sup>①</sup>王尧对此寄予了更加学术性的认识和展望，他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史料的挖掘、整理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虽然已有不少进展，但在我们视野之外的许多史料文献或者向隅，或者正在消失。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sup>②</sup>张志忠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需要认真的发掘，这一努力永远不会停止。但是，这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话题，因而是有着持续关照的必要性的。”<sup>③</sup>因此，正是基于这些理论与现实的需要和渴求，本书选取了检讨——这一虽为学界有所关注，然而又没有做到整体关怀和具体关注的另类文字，以期能够对那些饱受质疑的问题做出部分的学理回应。

当然，在有限的篇幅内，如何选取典型是一个关键问题。或者说，选取哪些有代表性的作家才能够完整地呈现这一时期文学转型的基本面貌是至关重要的。鉴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和情状，并结合1940年代后期因内战带来的影响，也借助和参照主流政治的说法，本文分别选取了以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为代表的“反动作家”，以巴金、老舍、曹禺等为代表“进步作家”，以夏衍、茅盾、胡风等为代表的国统区左翼作家，以丁玲、赵树理等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选取这样四组作家，虽不尽完美，但也可以说，既充分考虑了代表性，又兼顾了现代作家的思想主流。至于所谓转型期，本文将其界定在1949—1957年间，是因为1957年“反右”后，文学大一统的格局基本完成。

还要说的是，事实上，无论怎样努力，历史的本来面目都是

- 
- ① 黄平：《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后果——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的经历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15卷；本文引自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第409页
- ② 王尧：《改写的历史与历史的改写——以〈赵树理罪恶史〉为例》，《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 ③ 张志忠：《强化史料意识 穿越史料迷宫——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